

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期，在上海的淮海路、衡山路一带，时常可以见到身材高大、皮肤白皙，穿西服或皮夹克、有时戴鸭舌帽的外国男青年（也有女性，但好像不多）。那时上海的外国人不多，而他们多是人称“白俄”的流亡者。

这些白俄青年一眼看去，就与当时的苏联人不同——虽然同祖同宗。区别主要不在服饰，而在于气质神态。他们和家人这么多年来在异国他乡过着穷困、漂泊、没有保障的生活，即便长相轩昂，气度上也不免欠缺。

那样的日子里，我与白俄和苏联人都曾有过一些直接间接的接触，亲身

感受到他们的差别。刚刚解放的中国，掀起了一阵学俄语的热潮。教我们俄语的年轻女教师叫玛莎。她父亲迪利济也夫是莫斯科音乐学院教授，当时应邀担任上海音乐学院附中校长。玛莎和母亲、妹妹也一起来到上海。她身材高挑，一头浅棕色短发，端正的脸上有着淡淡的雀斑。

玛莎热情直率，自豪地说自己是标准的莫斯科发音。她不会中文，只用俄语授课，我们学员则根据教科书上的中俄文字对照着学习。有时玛莎想对某些重点作解释，或者想跟学生做些交流，就连比划

笔者有位亲戚林先生，最近因便血到医院诊治，经检查是肠癌，已属晚期并广泛转移。他后悔地对我说：现在想想真后悔，单位每年组织体检，我都做逃兵。如当初去体检的话，也许就可以发现疾病隐患，及时治疗了。

日前笔者电话采访了本市5家体检中心，询问体检缺席情况，令笔者大吃一惊。据几位负责人介绍，单位组织员工或退休职工来体检，总有些人不来，有的缺席率高达10%—20%。究其原因有这样几种情况：有的自我感觉很好，认为身体没有疾病，不来参加；有的怕检出疾病，心理压力，吃不好，睡不着，整日精神恍惚，还不如捂着；还有的员工嫌路途远擅自不来；有的领导干部则因有这样那样重要事情或会议不来体检。

而今组织体检多是单位出钱，体现了单位对在职工工或退休职工健康的重视和关心。因此每个人都应珍惜这种福利，自觉参加体检，不要借故缺席。现在许多疾病，早期发现治疗还有效果，而到了晚期已无法救治，会危及生命。而体检正是发现疾病隐患的重要环节，是实施“早预防、早发现、早治疗”方案的有力措施。因此我们劝那些“自我感觉好”、不想体检的员工，莫掉以轻心，麻痹大意。工作忙、路途远不应成为不体检的“理由”。健康是人生的基石，是人生的第一财富。丢失健康，就是丢失了人生一切。涉及个人健康的事情，比其他什么事情都重要，体检不能随意缺席。

体检下来，尽管有些人没有检出什么大毛病，但在体检报告结论部分，医生也提出了一些忠告，如加强运动，平时减少油腻食物的摄入，把烟戒了，注意八小时睡眠等，这说明我们有些人的身体还处于亚健康状态，一些指标还未达到理想要求，还需要通过适当调节和平衡来提高自己的身体素质。这些忠告值得人们好好记取，在日常生活中加以改进。

世界上身价最高的员工食堂在哪里？我想，恐怕没有哪处可以跟挪威奥斯陆的弗雷阿(Freia)巧克力工厂比肩了。

上月，参观完毕蒙克150周年艺术展之后，挪威文化部门邀请全球的记者驱车前往弗雷阿巧克力工厂，笔者有幸同行。原以为，这只是一次城市旅游推介，因为听当地人说，这座工厂曾是挪威最大的巧克力生产商，至今还占据着挪威巧克力和糖果的半壁江山。

走进这家工厂，所有人惊呆了！大艺术家爱德华·蒙克在他们的员工食堂（见右图）里画了12张画。工厂老板并没有将这些绘画锁在银行保险柜里，而是继续挂在食堂和普通员工相伴朝夕，职工们在用餐时就能欣赏——近一百年来，这是这座老厂的员工福利。“在这里工作，真觉得很受宠爱啊，每天都能享受蒙克的艺术。”巧克力工厂总经理蒂娜·索恩自豪地说。在蒙克150年诞辰纪念活动期间，这里向公众开放，过了这阵子，这批画作又只能成为“员工专享”了。

食堂配用高级桦木桌椅，12张绘画环绕四周，显得极为摩登。当年，蒙克选择了奥斯高特兰地区的乡村风景入画，描绘出故乡的居所、孩童、小桥。和他典型绘画风格里笼罩着的阴郁和寡欢不太

一致，12张绘画都以绿色和黄色为主要色调，轻盈而欢快。那时的蒙克已经在欧洲地区有了声誉。

12张画的背后故事有些一波三折，每一代工人都知道：当时的工厂老板赫斯特是蒙克的发小，他向蒙克订制绘画，来装饰自家工厂的食堂，计划在1923年工厂成立25周年之际交付12张。60岁的蒙克允了这桩差事。当时，表现主义画派刚刚萌芽，工人们的审美还是符合老派的自然主义。他们认定这些画作偷工减料——有些人像没有脸蛋，有些房间没有门和烟囱，这哪是正儿八经的画呀？在蒙克交货时，工人们不买账这种抽象艺术，嫌挂在自己每天吃饭地方很别扭。于是蒙克被要求“返工”，修正这些细节，大艺术家心不甘情不愿地同意了，只提出一个条件，每天要有人开专车在厂门口等他收工。有一天，那辆车没准时到，愤怒的蒙克冲到老板办公室，把刷子和画笔朝老板扔去，说，你自己来收拾这个烂摊子吧！自此拂袖而去，再也没有回来过。所以，今天看到的画作上，屋子还是没有

带说，眼睛里闪烁着急切。但刚刚开始学俄文的我们，词汇量有限，不能理解和沟通的时候很多。她只得耸耸肩叹口气，摇着头尴尬地笑。

后来她教我们唱俄文歌、朗诵短诗。玛莎身上既有着没有消退的孩子气，也有着少女的浪漫。课余，她用我们还半生不熟的俄语告诉我们，她的未婚夫是一位在莫斯科工作的工程师，她可能很快会回去完婚。

记得，一九五三年三月五日，往常开始上课的时间到了，却见玛莎满脸泪痕，步履踉跄地跑进教室，捶着胸哭诉：“斯大林同志，他，他去世了……”然后抽泣着摆摆手，跟大家说，今天的课不上了。

以后一段日子，她没有再来。第二个学期换了位俄语老师，听说玛莎回莫斯科去了。

而我接触过的一位教芭蕾的女教师尼娜，是白俄。她大约三十七八岁，中等身材，一头漂亮的浅黄色金发总用白色亚麻手绢随意地束在脑后，那双沉静的蓝灰色眼睛里好像有着化不开的忧郁，几乎很少与我们目光接触。平时和上课时，她都很少说话，只是发出动作指令和数节拍。

每次，她都准时进教室，径直走到钢琴边的座椅坐下，换好舞蹈鞋，就开始上课，非常认真地教动作和纠正动作。我很喜欢看尼娜把所教动作连贯起来做示范，一气呵成的舞姿优美流畅；而且在这一瞬间，她的蓝灰色眼睛会忽然明亮起来，闪现难得

一见的生动。

她的钢琴伴奏，是个头发稀疏而略带鬻曲、鼻尖微微发红的老头，好像他自始至终从来没有开过口，不知道他发出的声音，会是什么样的音色。他也总是径直走向钢琴，熟练地拉出琴凳坐下，打开琴盖，把带来的乐谱翻开放好，接着，双手放在琴键上，在开课前一直接保持着这个姿势闭目养神。

我注意到，每当伴奏间隙，他就会不失时机地从旧西服内袋掏出个方方扁扁的酒瓶，仰头喝上一

口，再放回衣袋，之后半闭着眼睛继续弹奏。他为舞蹈伴奏的每支曲子都非常娴熟准确，就像一本陈旧泛黄，然而每小节的音符都校对得很准确的破旧的老乐谱。

这两个人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，不愿意开启与人交流的扉扉。他们生动的灵魂留在了门扉之内，我们见到的只是为谋生而奔走的躯壳。

不过在一次学习汇报联欢会上，玛莎带头起哄，一定要尼娜唱支歌。望望这个平时多一个字都不说

“那好，我给您100块钱。”老人叹口气：“我不接受施舍。打扰您了，再见。”作家灵光乍现，说：“且慢，如果有两条狗一起吠又怎样呢？”老人乐了：“太好了，我儿子也会学狗叫。”

作家认真地修改剧本，最后把故事从大都市搬到了冰天雪地的爱斯基摩人家。这工程可真不小！别笑话他俩是一根筋，却忽视了一些闪光的品质。

有位编剧写了个剧本，正作最后的润色。一位老人走进他家，嚷嚷着说了一番话：剧本中有个狗叫的情节，他就是模拟狗叫的口技艺人。他家境贫寒，老妻卧病在床，问作家能否多设计几次狗叫，让他能多赚一些劳务费？

作家挺为难：“狗吠的次数是按情节设计的，不能随意增加。请问，如果多一声狗吠，您能赚多少钱呢？”“每晚3块。”

门，屋顶还是没有烟囱。

世界上还有没有其他员工食堂里会挂有一件世界级画家的绘画？更何况还是12张。全球的艺术记者们开玩笑说，应该没有了，这也可能是地球上身价最高的员工食堂了。谁都知道，蒙克作品《呐喊》去年拍出了1.2亿美元（《呐喊》存世有4个版本，仅这件是私人收藏），拍卖场里的价格，能让世上大多数的富翁们感到囊中羞涩。

工厂老板当年支付蒙克多少报酬呢？总经理蒂娜·索恩透露，8万克朗，这笔巨额的酬劳在当年等于1个普通工人60年年薪，老板可谓下了血本。不过，在今天看来，这项投资太过划算了。记者们在蒙克的画前就坐，并随意取用工作餐，北极虾沙拉和硬面包乏善可陈，但这顿午餐的“艺术风味”倒是让我难忘至今。临行，好客的主人还赠送了两版弗雷阿巧克力，他们把食堂里

去昆明之前，打印了厚厚一叠汪曾祺先生的文字，全是关于吃的。

为什么要去昆明，大半原因是想吃好东西，我是汪迷，在汪先生的笔下，昆明除了有绿汪汪的翠湖以及文林街的“摩登茶”，还有很多很多奇怪的吃食，蒸菜、干巴菌、乳扇、乳饼黑芥、韭菜花、茄子酢……“培养正气”汽锅鸡、吉庆祥的火腿月饼、东月楼乌鱼、还有他老人家说的一辈子都没有吃过昆明那样好的牛肉。我个人最想吃的还是当季的菌子，“牛肝菌下来的时候，家家饭馆卖炒牛肝菌，连西南联大食堂的桌子上都可以有一碗。牛肝菌色如牛肝，滑，嫩，鲜，香，很好吃。炒牛肝菌须多放蒜，否则容易使人晕倒……”每读到这里，我必然流口水。到昆明的当天，就有口福吃到菌子，在西驿酒店的晚宴上我发现了一盆黑乎乎、切得粉碎的不知什么菜，在众人还在迟疑不敢下筷的时候，我马上敏感地判断这应该是某种菌类，于是先下手为强，狠狠地挖了一大勺下饭，清香无比。后来公布答案是虎掌菌，虽然那么一小盘，已经是所有菜里最贵的一道了。

吃完酒店的东

西，不甘心，晚上和女伴们又跑去吃烧烤，还是在云大旁边的夜宵街，这是一家位置

隐蔽的烧烤铺，破烂无比，里面却别有洞天。因为晚上吃得太饱，我们只点了烧肉皮豆腐青菜，豆腐绵致有嚼头，烤猪皮入口即化又奇辣，我埋头苦吃，同伴促狭问道，你不怕辣么，我闷声道，我是湖南人。

第二天在翠湖晃悠，当然要背诵一下汪老的名句，“翠湖这个名字起得好！湖不大，也不小，正合适……”昆明的树好像到了冬天也还是绿的，尤其是雨季，翠湖的柳树真是绿得要滴下来。湖水极清。”导游说这是吴三桂的私家花园。在翠湖边我是存了心去寻核桃糖的，因为我惟一可以背诵的汪氏名句是吃核桃糖的“昆明的核桃糖极便宜，便宜到令人不敢相信。华山路南路口，青莲街拐角，直对逼死坡，有一家高台阶门面，卖核桃糖。我们常常从市里回联大，路过这一家，花极少的钱买一大块，边吃边走，一直走进翠湖，才能吃完。然后在湖水里洗洗手，到茶馆里喝茶。”

不知道为什么，遍寻不着核桃糖，只好用泡茶馆代替，靠近西南联大旧址的一个地方，寻了一间叫卡夫卡的咖啡馆，逍遥了一个下午。

的人，我实在怀疑：她肯唱吗？果然，尼娜脸红了，使劲摇头。爱热闹的玛莎坚持着，大家阵阵的掌声催促着，尼娜终于拗不过去。由于她向来太沉默，刚才的相持又营造了足够的气氛，对她的歌声我格外期待。

打动我的，并不是她的音色和歌唱技巧。但见她缓缓起立，微俯着头，当在钢琴的引曲之后再抬起头，尼娜的目光已经飘得很远，满眼深深的伤痛和迷茫。她的声音单薄，但是纯净。以我们有限的俄文，听不懂歌词，只凭直觉感受到，她在唱着一直埋藏心灵深处的怆痛。

一曲終了，尼娜眼里滚动着泪水……音乐是人类一种相通的心语，我们被深深打动。玛莎当然听懂了，明显有些黯然，轻轻地叹了口气。

事后，玛莎告诉我们尼娜很难得地向她吐露的一点身世：尼娜幼时随父母逃亡出来，也曾受过很好的教育，有着较高的艺术品位；但父母去世后，她四处飘零，后来落脚上海，先在一些舞厅里表演些舞蹈节目，如今在一些学校教芭蕾，生活很不稳定。她丈夫也是个流亡的白俄，往返于上海和海参崴之间做皮货生意，脾气暴戾，喝了酒还会打她。尼娜没有孩子，日子过得很忧伤。身份背景完全不同的玛莎，跟她是两个“阶级”，但作为“人”，善良的玛莎理解和同情她。

大约过了一年左右，听说尼娜随丈夫去了澳大利亚——滞留上海的白俄们，那阵捣乱后被通知离境。

跟着汪曾祺去吃昆明菜

黄佟佟

跟着汪曾祺去吃昆明菜

跟着汪曾祺去吃昆明菜

跟着汪曾祺去吃昆明菜

跟着汪曾祺去吃昆明菜

跟着汪曾祺去吃昆明菜

跟着汪曾祺去吃昆明菜

跟着汪曾祺去吃昆明菜

跟着汪曾祺去吃昆明菜

跟着汪曾祺去吃昆明菜

跟着汪曾祺去吃昆明菜

跟着汪曾祺去吃昆明菜

跟着汪曾祺去吃昆明菜

跟着汪曾祺去吃昆明菜

